

引 论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 50 年的光辉历程。

它的这个历程，首先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证明了由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着和推进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选择的伟大、光荣、正确。

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陆全面确立，固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年之后的 1956 年。但事实上，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已经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丢掉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明确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奋斗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质上正是这个科学社会主义选择的第一步胜利；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的历史选择的出现，虽然就现实根源来说，确实是当时国际国内阶级关系根本变化的直接产物，但如追溯其历史原因，便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又都是 1840 年以来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路的艰辛历程发展到当时的必然归宿。

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早自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就逐步选择了资本主义，开创了学习西方、效法西方的历史进程。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后的七八十年间，是这种学习和效法在内容上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整个社会制度，在方法上从通过改良到进行革命这样的由表及里、步步深入的历史时期。但所有

这些学习，都没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道路，没能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遇。资本主义选择每深入一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失败、挫折也随之深入一步。先进的人们由这一步步的失败中，继续认识中国和世界，感到资本主义选择不能拯救中国、发展中国，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转向学习俄国；从那里，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只是由于这个武器的运用，才开始发生有利于人民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是拿起这个武器，确立和实行社会主义选择的倡导者、宣传者、组织者。一部中国近代史，就这个层面而言，可以说，就是‘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①的历史；就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关系的演进、所处时代环境的转换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选择，产生了社会主义选择，而后又经过长期斗争，终于使社会主义选择在由少数先进分子的意志最后变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的同时，又由主观蓝图转化成为客观现实，也即是转化为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化为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之中正凯歌行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难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这一过程中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中国人民在选择自身历史道路的途中划时代的根本转折。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社会主义就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理想制度而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介绍到了中国。但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在中国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实现以后，又如何建设、发展这样的社会主义，这些介绍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者们却并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当时历史提出的迫切课题来予以解决和回答。真正回答并作为历史赋予的伟大实践任务而一步步解决了这些问题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解决成果，首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后就是扎根于中华大地上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解决的途径，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具体实际的不断的正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它的胜利与失误、前进和后退、发展跟曲折，都直接取决于是否实行了这种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正确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一部中国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发展史、胜利史，实质上也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结合史，是在这种结合中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事实一再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学说、运动，还是作为社会制度，都跟马克思主义的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直接熔铸在一起，具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最终取代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才得以实现；社会主义运动从工人阶级自发地反对资本剥削压迫的群众行动转变为自觉地、有组织有纲领地根本埋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的阶级战斗，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得以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由在国际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率先出现的“一国实践”的“孤岛”，扩展为“多国实践”的连成一片的“大陆”，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这些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实行了创造性的结合，才得以成功。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依据不同历史条件对它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科学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的全部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更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内在联系，证明了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也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来说，都具有首要的、决定性的意义。

领会这一点，最生动、最具体、最切近的途径，当然还是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

1840年以来所发生的整个近代的中国革命，一开始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历史指向。它不仅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还会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道路。只是在经过自己的前赴后继、奋斗牺牲和历史的多次检验、反复比较，证明了这条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之后，中国人民才终于在革命目标的选择上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最后转到了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才终于在领导力量的选择上由以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最后转到了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固然是整个近现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划时代的根本转折，但同时，它也更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长期推移过程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和继续。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客观固有的内在联系，首先就要明了这种联系得以产生的历史根源；也就是说，要由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历史进程中，由决定这种选择的不得以任何个人、集团和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客观规律中，深入揭示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对于这个必然性，对于中国人民认识、把握这个必然性并依之而做出自身历史选择的求索过程，正确地进行分析，科学地予以把握，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确认识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资本主义选择和社会主义选择之间的客观历史联系。

资本主义选择和社会主义选择，都出自于人民的觉醒。作为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争取独立、富强和人民摆脱贫困、奴役这两个基本主题的历史过程中，先后产生的两种方案、两条道路，它们的出现，都不是源于当时人们的主观好恶，而是源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选择的出现，固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选择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反映了决定人们主观选择的两种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嬗替而并不意味着也同时否定了此前人民为实现资本主义选择所进行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事实上，就当时的客观实际来讲，人民的历史选择发生由资本主义转到社会主义这种根本性变化，也只是由于国际国内客观条件、客观环境的改变而导致的解决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根本方案、根本道路的改变。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近代中国所要解决的历史主题本身。因而，社会主义选择与资本主义选择这两种对立的方案和道路之间，仅仅由于其所要致力解决的是基于同一国情的同一个历史主题，就必然会有许多相通的东西，产生和存在极为深刻的历史性的相承关系。对这一点，我们党不仅从来就没有加以回避和否认，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做过十分明确的郑重宣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1939 年，毛泽东就曾十分明确地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

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虽然他在这同一段文字中又进一步指出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但是，毛泽东却并没有因此而把共产党出现以后为实现社会主义选择所进行的斗争同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所进行的以实现资本主义选择为目标的历次斗争截然割裂开来。相反，他倒是斩钉截铁般地明确论定，所有这一切斗争“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①。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论断，还只是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主题以及资本主义选择与社会主义选择这相互嬗替的两种选择之间由于其所要解决的历史主题的根本一致，而必然具有的客观的相承关系，那么，他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就二者关系所作的下列论述，则进一步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历次革命斗争的主体意志的历史联系上，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前后嬗替的历史选择之间，基于所要解决的共同历史主题，而历史地形成的极为深刻的主观的相承关系。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中指出：“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

^①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8～559页。

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这，正是在实现我们的先人的遗志，使“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应该说，毛泽东在这里，是已经把由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选择及其第一步奋斗成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由其他中国先进分子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选择之间，所真实存在的相承关系，做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性的科学总结。事实也确实如此。社会主义选择之中，不仅包容了此前的资本主义选择所具有的一切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要求的革命内容，而且在其实践历程中，也首先是以实现这些革命内容为依归。因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选择所进行的斗争，从历史的角度讲，实际上也正是此前先进的中国人为实现资本主义选择、解决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历史主题而进行的一系列英勇斗争的直接继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照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基本路线而正蓬勃发展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此而言，实质上也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解决所面临的历史主题而进行的历次英勇斗争（包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为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所进

^①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行的历次斗争)的真正的收获物和惟一的继承者,是由于在当时国际国内条件下,资本主义已经根本无从实现,而且即便实现了,也已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基本主题,才最终引出的历史产物。中国人民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正是深藏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由这一国情所产生的这两种选择之间的上述极为深刻的历史联系之中。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得以产生的历史根由,揭示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不但不应把作为社会主义选择先驱者的近代资本主义选择及其最终命运排除于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恰恰应该以这两种选择前后嬗递、相承的历史关系,作为考察的重点。只有弄清了这个重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质上,正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的根本归宿,凝结了由这整个历史过程所昭示的全部根本经验。

一句话,就是只有弄清了资本主义选择与社会主义选择之间的这种前后嬗递、相承的历史关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其深远的历史由来,也只有了解、把握了这个由来,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使命,才能基于对这种地位与使命的清醒认识,而始终不渝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完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从而把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地持续地推向前进。

依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和以后中国人民对于历史道路的不同选择以及他们为实现这些选择所进行的不同斗争,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可以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生的中国社会主义选择，就是随着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过程的推移而产生于其第二阶段，并在其第三阶段中，得到了初步的实践与展开；而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选择，则构成这一社会主义选择本身得以产生的前史。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起源也即中国社会主义选择客观历史必然性的全部论述，也就因此，而不能不由之论起，作为开篇。

第一章

资本主义选择的步步 深入与一再失败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从鸦片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流产，是近代中国人民选择自身前进道路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选择的步步深入与一再失败，构成了这一阶段的根本特点。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就已经孕育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近代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选择，既不是这种旧社会内部的新因素本身积累、扩张的自发历史结果，也不是代表这种新因素的社会阶级随着自身的成长、壮大而起来争取政治统治权的自觉历史表现。相反，却是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情势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既自觉又被动的极为悲壮和痛苦的历史回应。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不仅并未产生自觉要求和论证资本主义的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启蒙思想家，而且，甚至连历史前进道路的自觉选择问题本身都不存在。其时，历史还只是依循其自身的惯性，于既定的道路上缓慢前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民，虽然感受到了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无比苛重并起而英勇反抗，但却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结束这一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问题。1840 年

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爱国的仁人志士，才不得不自觉地起来，寻找挽救危亡、振兴祖国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那个时候还正在孕育，没有产生；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中国由于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落后，也不存在理解、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最先映入中国人眼帘的，是先进、富强的西方。当时世界上，也确实只有西方最为先进。因而，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就不能不首先向西方学习，力图通过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实现民族的复兴。

首开这一风气的，是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

面对着鸦片战争中外敌入侵、国家虚弱的现实，他们率先突破曾严重束缚过他们本人的‘天朝’‘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这一导致闭关锁国政策的陈腐教条，勇敢地承认‘天朝’并非处处优于‘外夷’，而是还有‘不如夷之处’，进而开启了近代中国人放眼看世界、学先进的思想闸门。林则徐从鸦片战争失败的严酷事实中，首先看到‘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指出只有‘师敌长技以制敌’，才是卫国御侮之道。他提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用广东外贸关税的一部分作为经费，购买、仿造外国船炮，并强调‘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① 魏源的认识则比林则徐更进了一步。他对外国长技的了解虽然同样是主要集中于军事方面，^② 但却已经

^①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885 页。

^②魏源《海国图志》100 卷本，卷二《筹海篇·三》，见《海国图志》，中华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9 页；‘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从中看到，导致西方船坚炮利的大机器工业在民生日用方面将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途。他指出：“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①实质上，这是提出了在引进西方军事工业的同时，进一步将其先进技艺推广于某些民用工业的主张。魏源还从西方大机器工业中看到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他痛斥把当时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贬低为“奇技淫巧”的愚蠢偏见，指出西方的大机器工业及其新式技术：“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是“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的“奇技”，而决非什么“无用”的“淫巧”；只有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才能使“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才能实现“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的国富兵强的目标。他的这种由军事而及工业，再由工业而及科技的深入认识，正确把握了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内在本质，因而，他概括自己的主要思想而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③的口号，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在当时向西方学习其现代化生产力的一个行动纲领。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这个纲领，没有提出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张而只局限于学习其先进的生产力，因而还不能说他们已经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在承认当时中国生产力“不如夷”的基础上，提出赶超西方的目标，同时，又把在这方面学习西方、赶上西方与“制夷”即抵御列强

① 魏源《海国图志》100卷本，卷二《筹海篇·三》，见《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100卷本，卷二《筹海篇·三》，见《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见《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侵略结合起来，确实起了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作用，称得上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者。

魏源、徐继畲先后撰著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两书，全面描述、介绍了当时的各国概况，特别是欧美各国的先进生产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他们在这两本著作中，不但揭示了欧洲诸国之所以富强，全赖其‘以商贾为本计’^①‘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②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指出了实行对国事“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的议会制，乃是欧洲各国“皆从同”的共同政治体制；“不独英吉利也”。^③对于总统四年一任；“总无世袭终身之事”的美国民主政体，魏源和徐继畲尤其感到惊奇和赞赏。徐继畲说，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④魏源则认为；“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的美国民主制度；“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⑤应该说，在这些方面，徐继畲、魏源都已明显超过了林则徐的思想高度，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

①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四，《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2 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100 卷本，卷三七《欧罗巴洲各国总叙》，见《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7 页。

③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0 页。

④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5 页。

⑤ 魏源《海国图志》100 卷本，卷五九《墨利加洲总叙》、《弥利坚国总记上》；《海国图志·后叙》，见《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69、383、70 页。

甚至可以说,《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所表达的这些在当时更为深刻和更为超前的认识,正是近代中国全方位学习西方的伟大的思想先声。

自然,徐继畲、魏源对西方的这些描述,还仅仅是停留于介绍和称赞,而并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较之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所具有的根本优越性,更没有以此为依据而形成全面仿效西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治国、救国方略。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这些思想在当时也并没有能够形成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势力和社会思潮。因而,它也就没有能够成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当时行动纲领的一部分。就当时的客观历史影响与实际历史作用来说,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主要还是以其对学习西方先进生产力所进行的上述探寻,开创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为“救国救民”而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方向。

腐朽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不只是由于其中内在隐含着对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巨大挑战而根本不能接受徐继畲、魏源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介绍和赞扬,而且就连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所一致主张的不仅丝毫不触动其封建统治反而有利其加强统治的单纯学习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建议,也根本不能容忍,因而,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这个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力的纲领,也就没有能够实行,没有能够对当时中国的致富致强发生现实的指导作用。历史在那个时候就已证明,封建地主阶级已完全成为历史的阻力,已不可能引领中华民族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出路。

人民,只有人民,才循着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开创的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不断深化探寻国家出路的斗争,先后进行了三次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重大历史尝试。

第一次尝试，太平天国后期的 为政蓝图——《资政新篇》

1859 年产生的《资政新篇》，^①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为挽救革命、扭转危局而提出的一个政治纲领。他依据当时太平天国政事日非，内部不和，革命形势正走向逆转，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正自由发展并已对中国发生一定影响的时代大势“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提出了这个旨在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富国强兵，争取革命胜利，打倒清朝政府的为政蓝图。经天王洪秀全审定批准后，以天国中央政府的名义颁布。

贯穿《资政新篇》的一个主要内容，依然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它主张振兴科技，倡导以“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的当时的科技型产品为“宝”，以使人们都来学习“此正正堂堂之技”主张革新“制造”，建立能生产“精奇利便”的“器皿技艺”的新式工业 主张兴办矿业，开发金、银、铜、铁、锡、煤等矿藏 主张发展交通“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制造“利便轻捷”的火车、轮船，修筑省、郡、县、镇的公路，建立邮政，设邮亭、书信馆 主张兴修水利“立丈量官，凡水患河路有害于民者，准其申请，大者发库助之，小者民自捐助”。同时，还提出要开办银行，建立保险公司，以利“商贾士民”。《资政新篇》的这些主张，开始把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力由原则性的方向具体化为系统性的方案，可以说，已远远超过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高度。

^①《洪仁玕选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3～23 页，以下所引皆出于此，不再分注页码。

但是，它所实现的真正历史性的超越，主要还不在这里。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前进运动的产物，《资政新篇》的主要特点，它所体现的中国人民的历史进步，主要在于，它第一次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上，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全面构想。

首先，《资政新篇》不是一般地谈论学习西方先进生产力，而是明确主张依靠“富民”的经济力量来实现它所规划的那些建立和发展新式生产、流通事业的目标。比如，对‘兴银行’《资政新篇》就提出“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资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银行券）”；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

同时，《资政新篇》也不是离开具体生产关系的选择而谈论发展生产力问题。它十分明确地规定，兴办新式的生产、流通事业，学习西方先进生产力，应采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它提出，要效法西方国家‘禁卖子女为奴之例’；准富者请人雇工’，但明令其‘不得买奴’，以免‘貽笑外邦’。

再者，《资政新篇》又不是单纯从获取使用价值的角度而是同时从获取价值的角度去解决发展生产力的动力问题，明确主张要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对‘兴银行’的‘富民’，它规定‘准每两取息三厘’；对‘兴宝藏’者，它又准其以生产总值的 $\frac{2}{10}$ 作为利润。

最后，《资政新篇》还从保护、鼓励新生产力主体这一方面，明确规定了要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制度。比如，对于创造、发明火车、轮船及其他工艺品者，它规定‘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无益之物有责无赏’；限满’才准‘他人仿造’。

《资政新篇》所规划的这一幅幅社会生产关系蓝图，表明了它

在对西方的学习上，已从生产力的层面跃升到生产关系的层面。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历史选择，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问题在于能不能实行，有没有实效。

《资政新篇》虽然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和如何解决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缺陷，但它“如能实行，宽以时日，当可使太平天国的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日趋富强，击灭清朝封建政权，反抗外国侵略者，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拯救出来”。^①只是，太平天国后期，封建化趋势愈演愈烈，内部不和亦日趋严重。洪秀全“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经年不见臣僚”；“不问国中军事之事”；^②以至“战局日非，国土日蹙，苟延残喘”；^③因而也就根本谈不上进行内部改革，实施《资政新篇》。不久，太平天国就在国内封建势力和入侵的西方列强的联合绞杀下遭到了失败。中国近代史上这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选择方案，未及实施，即被它所师法的“先生”及其走狗残酷地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历史证明，农民“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过多次动摇，只好倒退回去”；^④而且，他们只能倒退到封建主义。因为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

① 郗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2次修订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

②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注》，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4、306页。
“经年不见臣僚”一语，见曾国藩《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曾国藩奏稿》卷三。

③ 郗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2次修订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9页。

④ 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31页。